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 洗恒汉罪行材料

(内部材料, 供批判用)

中共甘肃省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印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目 录

一、投靠林彪、“四人帮”，主动配合、积极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 (一) 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2)
- (二) 与“四人帮”紧密勾结，大搞阴谋活动…………… (3)
- (三) 与“四人帮”在上海的“第二武装”遥相呼应…………… (7)
- (四)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加紧了同“四人帮”的反革命勾结…………… (10)

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疯狂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紧跟“四人帮”另搞一套，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效劳

- (一)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搞“三箭齐发”，大批所谓“现代大儒”和“复辟”、“回潮”，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12)
- (二)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大搞“反经验主义为纲”，打“土围子”，把专政矛头对准人民内部，指向党内…………… (16)
- (三) 积极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疯狂打击、诬陷叶副主席和邓副主席…………… (18)

三、培植资产阶级帮派势力，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建立组织基础

(一) 在省委内部拉帮结派，搞凌驾于常委之上的“小核心”和“小常委”，指派亲信严密控制要害部门…… (25)

(二) 大搞“双突”，包庇、重用“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所谓“新生力量”，扩充帮派势力…… (26)

(三) 制造分裂，依靠亲信，打击、排挤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省委领导同志…… (28)

(四) 以各种卑劣手段打击、迫害革命老干部和持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 (29)

四、全面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给各条战线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 (33)

五、同“四人帮”一样，大耍资产阶级官老爷作风，称王称霸，高高在上，蛮横无理，弄虚作假，严重脱离群众，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 (41)

六、对抗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极力破坏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45)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洗恒汉罪行材料

英明领袖华主席、敬爱的叶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重要指示”传达以后，在以宋平同志为首的省委领导下，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紧密联系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对洗恒汉等人的严重路线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批判。几个月来揭发出的大量事实说明，洗恒汉的错误性质极其严重，是“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长期以来，洗恒汉违背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投靠“四人帮”，紧跟“四人帮”，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积极地、全面地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对甘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危害。为了彻底揭批洗恒汉的严重罪行，彻底砸烂“四人帮”及其余党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在甘肃的势力，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使我省的各项工工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实现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现将洗恒汉的主要罪行整理印发，供大家进一步揭发批判。

一、投靠林彪、“四人帮”，主动配合、积极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洗恒汉就积极推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

义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支一派，压一派，疯狂反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被林彪反党集团封为“西北的左派领袖”。林彪叛国投修以后，洗恒汉又一头栽进“四人帮”的怀抱。一九七五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敬爱的叶副主席就“四人帮”的问题已经给他打了招呼，他根本听不进去，削尖脑袋硬往“四人帮”的“帮中央”里钻，越靠越近，越勾越紧，越陷越深。

（一）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在党的“九大”选举时，洗恒汉同林彪反党集团串通一气，大反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阴谋篡党夺权。洗是西北组召集人，他给代表们传达说：“上面（指林彪反党集团）有个精神，给那些老右倾（指朱德、叶剑英、陈毅、陈云等革命老前辈）不能投全票。……，让我们可以交头接耳，我们今天安排一下，谁该投全票，谁该投半票，心中就有数了。”随后，由他一手策划，对哪些代表投全票，哪些代表投半票，一一作了安排和布置，积极配合了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洗恒汉按照林彪反党集团的旨意，伙同胡炜（原二十一军军长，后调总参工作）等在西北组带头“起哄”。洗恒汉在小组会上煽动说：“有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指挥的，你们答应不答应？”胡炜也造谣煽动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毛主席是‘天才’，

反对学习‘老三篇’，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指挥的。我看这些人是阴谋家、野心家，建议中央常务委员会把这些家伙揪出来坚决斗争。”他们逼着代表表态，强行作了两条决议：一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坚决要求在宪法上写设国家主席一章；二是把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阴谋家、野心家揪出来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对林彪的反党阴谋活动进行了彻底的揭露。洗恒汉做贼心虚，极力掩盖自己带头“起哄”的罪行，在小组会上一再表白自己是“正确的”，早就“心中有数”。回来后，洗恒汉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在暗中继续与林彪反党集团紧密勾结，直到“九·一三”事件前，他还给林彪写“劝进信”，支持林彪抢班夺权。

（二）与“四人帮”紧密勾结，大搞阴谋活动。

洗恒汉与“四人帮”的勾结由来已久。一九六九年，反党分子张春桥背着国家计委，直接给洗恒汉打电话，要甘肃安排七千名上海技校学生，洗恒汉立即照此办理。反党分子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的老婆在兰州工作，一九七〇年九、十月间，为将戴的老婆调往上海，反党分子张春桥特意给洗恒汉写信，洗批准了调动。

反党分子江青对洗恒汉非常赏识。一九七二年洗恒汉到北京参加中央会议，江青特意让她的秘书将毛主席批评林彪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稿手抄了一份，送给了洗恒汉。洗把这个材料拿回后，让人照原样打成直排本，广为散发，显示江青对他很信任。

党的十届二中全会期间，反党分子江青窜到洗恒汉住处搞阴谋活动，密谈一、两个小时，还特意给洗送了两袋广柑。一九七三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批林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上，江青又对洗恒汉说：“在解决新疆问题时，你那个发言很好，支持了我。”在解决西北四省区问题时，洗提议让反党分子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作记录，江青支持洗说：“很有必要”，并称赞洗的汇报“意见很重要”。还特意告诉洗说：“大西北很重要”，“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壮族就有两个中委”，又赞扬洗是“经过党多年培养的、不可多得的少数民族干部”。

反党分子王洪文和洗恒汉互相吹捧，抱成一团，大搞反革命勾当。一九七三年春，洗在一次大会上吹捧王洪文“年轻、能干。”王洪文去新疆“解决”新疆问题时，洗恒汉吹王的讲话“很有水平”。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我省有人给反党分子王洪文、江青写诬告信，为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这封信由洗转送给王洪文。王即指令有关部去查，搞得这个部和有关厂不得安宁。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反党分子王洪文跟洗恒汉一起吃饭喝酒，密谈达数小时，恶毒攻击邓小平副主席，大搞反党阴谋活动。王洪文向洗恒汉交底说，批×反击右倾翻案风“上海、辽宁已经搞到支部了，有的已经点名批判了”。洗恒汉趁机攻击邓副主席“好象是对文化大革命有点气”。当王洪文问到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时，洗恒汉立即答复说：“这就叫复辟，不然你还不知道怎样叫复

辟”，诬蔑铁道部是“死水一潭，可不能小看”。王洪文夸赞说：“甘肃这几年形势不错嘛，除了上海、辽宁，就是你们甘肃了。”并说：“你是老前辈，我要向你学习”，“希望你这样的老前辈能够多活几年，多干几年。”王洪文还说：“西北我不熟悉，只去过一次新疆，以后有机会去看看”。洗恒汉赶忙说：“欢迎你去”。吃饭时，王洪文和洗恒汉频频碰杯祝酒，高喊“为打倒×××干杯”，鼓吹“四人帮”“一定要胜利”，“×××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失败”。在这次密谈中，洗恒汉还向反党分子王洪文诬告了兰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为“四人帮”打击陷害党政军负责同志、阴谋篡党夺权提供了“炮弹”。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洗恒汉多次写信诬告兰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最猖狂的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中旬，他一方面直接向反党分子张春桥写信诬告韩先楚同志，另一方面又授意他的亲信淮文瑄（原省委副秘书长）、陈文生（洗恒汉的秘书）等联名写诬告韩先楚同志的黑材料，还派田玉（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专程去礼县让其同伙年继荣附上亲笔信将这份黑材料寄给了“四人帮”死党毛远新。在这些黑信、黑材料中，洗恒汉等人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恶毒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韩先楚同志。与此相配合，他又纵容其亲信在地方和兰州军区大肆散布诽谤韩先楚同志的言论，纠集反对韩先楚同志的势力，配合“四人帮”打击陷害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党夺权的阴谋，掀起了倒韩的恶风浊浪。粉碎“四

人帮”后，洗恒汉心怀鬼胎，想方设法掩盖其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多次和他的同伙年继荣密谋，把写诬告信说成是“正常的”，“不算个问题”，并且“还要保密”，以此欺上瞒下，对抗华主席、党中央，对抗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洗恒汉和“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也勾得很紧。一九七四年，全国四届人大召开时，“四人帮”死党毛远新亲自给洗恒汉送了油莎豆，洗如获至宝，视为“四人帮”的“关怀”，让省农办将此“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在全省一些地区试种，并让将试种情况向他专门写了汇报，以表忠实。一九七六年，洗恒汉还对“四人帮”余党庄则栋说他同毛远新“有过接触”，并说：“这个青年同志是不错的，他年轻，很老练，很动脑子想问题。”吹捧毛远新。一九七六年七月，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派他们的余党、亲信分赴西南、西北、东北、华东等地进行阴谋活动。庄则栋领受反党分子王洪文的旨意，打着调查农村体育工作的幌子，来甘肃进行反革命串连，大肆攻击毛主席的革命体育路线，诬蔑解放十七年来的体育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体育”，胡说“体育革命的阻力是党内资产阶级”，宣扬体育战线要绕开周总理的指示，继续贯彻林彪一伙炮制的所谓“五·一二”命令精神，公开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贺龙同志。庄来甘肃是寻求支持的，“发动下面攻上面”，煽动大家“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要和大人物斗，不要怕大人物压”，妄图借“体育革命”，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

干部。洗恒汉一伙对庄的来意心领神会，积极配合。洗恒汉的追随者秦彦章完全支持和接受了庄的修正主义观点，大搞“罢赛”，拒绝我省派代表队参加全运会几个赛区的比赛，强令学生、社员停课、停产，做广播操、打太极拳、练武术、打篮球，还组织了一千多人的队伍欢迎庄则栋。秦陪庄到临泽县期间，庄煽动临泽县体委以贫下中农名义写信攻击国家体委专业队，刊登在《体育报》头版头条，充当了庄则栋反党阴谋的急先锋。洗恒汉的亲信禹贵民陪同庄则栋参观刘家峡水电站时，庄向禹交了“底”，禹特地安排一个公社为庄准备了武术表演，让庄在群众大会上放毒。洗恒汉的同伙年继荣更是忙的不可开交，年同庄多次密谈，诬告韩先楚司令员，向庄打听中央的消息，吹捧“四人帮”及其余党，恶毒攻击邓副主席，又让田玉挂专线电话给正在张掖的洗恒汉，约洗会见庄则栋。洗恒汉把庄当作“通天”的钦差大臣殷勤接待。他在张掖和庄单独密谈，一起打乒乓球，吃饭喝酒。事后庄对人说“和洗政委谈得很好”，称赞洗“对青年干部有打算，有远见。”庄还说：“我转了西北几个省区，数甘肃最稳、最好、最放心，对甘肃我最感兴趣。”“这次到西北要找的人都找上了，都对上了号”。庄则栋刚刚离开兰州，洗恒汉就在兰州军区发动了围攻韩先楚司令员的“交心会”，还鼓动一些人在下面恶毒攻击韩先楚同志。

(三) 与“四人帮”在上海的“第二武装”遥相呼应。
洗恒汉配合“四人帮”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阴谋，极力推行上海

民兵“新鲜经验”，大搞与人民解放军相对抗的“第二武装”，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一方面到处大造“第二武装”的反革命舆论，吹嘘是什么“在民兵建设上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是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方向完全正确，路线完全对头”，还别有用心地说：“战争打起来后，民兵枪口对准谁，这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平时就要着手解决。”另一方面又积极策划建立“第二武装”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冼恒汉接到在中央读书班学习的亲信李世祥（原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来信：“看到了辽宁省和上海市两个有关民兵工作的材料，他们搞得很好，有些经验非常值得学习，建议派人到辽宁和上海去学习。”冼恒汉对其亲信传送“四人帮”的旨意心领神会，立即指使一些人多次到上海“取经”，并说：“学不学上海，这不是方法问题，而是路线问题。”在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由他一手策划成立了“兰州工人民兵指挥部”，亲自指定他的亲信牛体君（原省委常委）、许存贵（原省革委常委）、李宗虎（原省革委副主任）掌握，又分派他的亲信蔺进生（原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定发（原省委常委）直接指挥。在冼恒汉的授意下，给兰州工人民兵指挥部拨巨款，盖大楼，派车辆，定机构，配干部，把它搞成了学习上海的“样板”。全省八十三个县（区），有六十七个也建立了民兵指挥部。

冼恒汉一心想把“第二武装”搞成取代人民解放军，配合“四

人帮”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重要支柱，不让党委领导民兵，不让军队管民兵。他公开讲：“搞民兵指挥部就是不让军队搞，什么都叫军队搞不行”，还说：“我不靠军队靠民兵，兰州有几十万民兵。”民兵指挥部机构编制、干部任免、活动经费都是由冼恒汉等人直接决定，省军区一无所知。冼恒汉为了加强对兰州“第二武装”的控制，培养效忠“四人帮”的感情，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先后指令牛体君、许存贵去中央读书班深造，直接领受反党分子王洪文的黑指示。

一九七五年，中央领导同志揭露了“四人帮”搞“第二武装”的阴谋，中央军委也讨论和规定了武装部的编制，但是冼恒汉拒不执行，继续照“四人帮”的那一套办。在他的授意下，同年六月二十四日，《甘肃日报》发表了《学习上海经验，实行三位一体的武保机构》的文章，在全省进一步搞起了民兵、治保、消防“三位一体”的机构。使民兵指挥部完全脱离了地方党委和军事部门的领导，自成体系，为所欲为。冼恒汉以“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为幌子，指令到处搞民兵小分队、劳动教育学习班，私设公堂，有的单位还设制了铁笼子，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引起了强烈的公愤。

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步伐的加快，冼恒汉对民兵指挥部抓得也越来越紧。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之后，冼恒汉背着大军区、省军区和省委，授意他的亲信拟制了一个以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民兵“应急方案”，计划动用七千五百名徒手民兵和四十五

个武装民兵连，规定了掌握兰州形势、出现情况适时合围分割、矛盾激化组织镇压的主要任务，控制了兰州四个区的三十多个制高点。四月十八日，冼在一份材料上批示：“省、市公安局，都要学习北京市公安局处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经验，运动期间和平时，都要派一些人混杂在人群中听其讲话，弄清其单位和身份。”用特务手段对付群众。六月十九日又组织七万民兵武装游行，向群众示威。八月兰州军区召开民兵、人防会议，冼恒汉把兰州工人兵指挥部树为学习上海的“典型”，强令西北四省区参观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积极在上海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反党分子王洪文背着华主席、党中央，在九月十一日让他的秘书米士奇给冼恒汉打电话说：“有什么情况，及时向王×××汇报”。冼恒汉便在兰州加紧准备，遥相呼应。指派亲信蔺进生、胡定发按照他的“应急方案”，于九月十二日由十一个武装连一千一百人组成“机动分队”。九月十五日民兵指挥部连夜配发自动武器，随身携带，昼夜不离，准备随时执行“应急任务”。除此，还抽调基于民兵组成“快速分队”，配发了摩托车十二辆，又将炮兵阵地重新调整，改为面向市区、公路和桥梁，搞得杀气腾腾。直到去年十一月《解放军报》发表了批判“四人帮”搞“第二武装”的文章后，冼恒汉还向牛体君布置说：“你们要稳住，该干啥的还干啥。”妄图继续顽抗。

(四)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加紧了同“四人帮”的反革命

勾结。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在省委发给党中央的唁电中，冼恒汉坚持要写向反党分子江青“表示最亲切的慰问”，以示“效忠”。唁电发出、尚未登报之前，有的工作人员曾向他提出，很多省的唁电都没有“慰问江青”的话，我们是不是去掉？冼说：“不取照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九月十二日，冼恒汉到北京参加毛主席吊唁活动时，反党分子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特意到冼的住处探望、密谈。冼的秘书陈文生给米士奇奉送了白兰瓜、药材和香烟。冼恒汉回来后吹嘘说“四人帮”“对我们很好，很重视，把我们放到前面，紧跟着王×××的后面”。冼恒汉的一些亲信还在群众中散布说：“冼政委要调去当总政治部主任”，“要进中央政治局了”，炫耀“四人帮”对冼恒汉非常器重。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在首都追悼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大会上，华主席代表党中央致了悼词。第二天，冼恒汉以省委名义搞了一个所谓的五条决定。这个决定中不讲认真贯彻落实《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华主席致的悼词的精神，却大讲什么“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还在各个方面同无产阶级较量”，要牢固树立所谓对“修正主义”、“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大讲坚持不坚持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对毛主席遗志忠实继承还是阳奉阴违的问题”；大讲对“中央的领导（实指‘四人帮’）不得非议、不得怠慢”，到处追查不满“四人帮”的所谓“谣言”，

搞白色恐怖。公开同英明领袖华主席致的悼词唱反调。同年十月十四日，“四人帮”通过《光明日报》抛出“梁效”的反党文章，发出了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动员令。这个黑文未出笼之前，洗早已得知，紧密配合，在十月六日全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的闭幕会上，他不讲农业学大寨，不讲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却别有用心地一口气讲了二十一个“按既定方针办”，扬言谁不“按既定方针办”，谁就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死对头”，“就要和他斗到底”。同“梁效”的反革命叫嚣相呼应。

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疯狂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紧跟“四人帮”另搞一套，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效劳。

洗恒汉在组织上投靠“四人帮”，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四人帮”亦步亦趋，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敬爱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充当了“四人帮”反党乱军的急先锋。

(一)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搞“三箭齐发”，大批所谓“现代大儒”和“复辟”、“回潮”，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一九七四年二月间，批林批孔刚开始，洗恒汉的亲信李世祥

从中央读书班带回反党分子王洪文的所谓“新精神”，他立即响应，坚决贯彻，大搞“三箭齐发”、“放火烧荒”。他按照“四人帮”的腔调，大肆散布什么“走后门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煽动说“什么实际都可以联”，“你们不要怕乱，乱了我们可以说话嘛”。煽起了一股不批林、不批孔、大反走后门的阴风。

“四人帮”搞“三箭齐发”的阴谋失败后，洗恒汉继续紧跟“四人帮”，按照反党分子江青在天津的一次黑讲话，大讲特讲“批林批孔就是批旧势力”，叫嚷要批“现代大儒”，要“向现代孔夫子开炮”，要大家“从批儒评法联系到现实阶级斗争”，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叶副主席。不仅如此，他还把“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主办的反动杂志《学习与批判》上的《论孔丘其人》、《再论孔丘其人》等反革命黑文，叫大家“好好学习”。一九七四年七月三日，他在省委五届五次、省革委会十二次全委扩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还别有用心地说什么“当前，我省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运动还搞的不够深入和普及”，其中一条是“没有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认真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于是，他紧密配合“四人帮”，大量传抄、到处贩卖“四人帮”的黑讲话，利用各种舆论工具，捧吕后，大树江青，骂宰相，借古讽今，以评法批儒为名大反周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洗恒汉又紧跟“四人帮”竭力破坏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全省人民极其悲痛，不少地区、单位和人民群众纷纷

向省委写信、打电话，要求戴黑纱、白花，开追悼会，寄托对周总理的深切哀思。洗恒汉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置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于不顾，下令不准戴黑纱、白花，不准开追悼会，并且在一月十三日省委召开的一次会上顽固地坚持说：“省委再也不搞什么活动了。”但是，他却支持其亲信张恒云在兰州铁路局出动广播宣传车，大肆叫嚣“反击右倾翻案风”，配合“四人帮”干扰、破坏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清明节时，兰化部分群众到华林山烈士陵园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洗恒汉一伙指令动用工人民兵加以阻拦，当成“反革命事件”进行追查。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广大干部和群众怀着对“四人帮”迫害总理的强烈义愤，怀着对总理的衷心爱戴和深切怀念，再次要求省委召开纪念大会。宋平同志支持群众的要求，主持会议研究提出了纪念大会的方案。第一次电话请示洗恒汉，他借口洗澡不接电话；第二次电话又请示，他以“不了解情况”一推了事。由此可见洗恒汉和“四人帮”一样，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怀着刻骨的仇恨。

在大反周总理的同时，洗恒汉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动员令还在全省层层揪所谓“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大打出手，搞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严重政治事件。他秘密收集福州批林批孔中攻击诬蔑韩先楚同志的文章，组织一些人贴大字报，围攻韩先楚同志。他布置亲信批判宋平同志，把宋平同志一九七二年主持召开的讨论工业学大庆的省委工业会议，诬蔑为“回潮”、“复辟”会，“把文化大

革命中批判了的东西又搬回来了”，等等。在全省范围，他反复强调“要把批林批孔（实指‘层层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当作头等大事抓紧抓好”。反党分子江青假造了河南马振抚中学事件，洗恒汉从《甘肃日报》“内参”上看到我省建工一局二中教师肖道智同志所谓搞“师道尊严”的材料后，立即批示说这是“严重事件”，并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叫嚷要“通报全省”，“要很好批判”，“要以省委文件发出”。他不仅亲自签发这份文件，还要“迅速查清”由于“师道尊严”在全省所造成的“迫害事件”。在他的指令下，先后抓了二十多起甘肃的所谓“马振抚事件”，还树立了甘肃的“交白卷”典型和“黄帅”式的人物，破坏批林批孔，破坏教育革命，给全省教育战线带来了严重恶果。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反党分子江青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给河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写了一封黑信，送了材料，妄图干扰破坏批林批孔运动。二月六日这封黑信传到我省后，洗恒汉立即批示：“不要等给常委汇报，要立即行动起来，知青办要抓一个点，注意发动下乡青年”。他还指令报社要写这方面的报道，并以省委名义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每人一套批林批孔材料，要省知青办组织下乡知识青年学习反党分子江青的黑信，流毒很广。对江青的一封黑信，洗恒汉如此卖力贯彻，闻风而动，可是对叶副主席的指示却视若罔闻，公开对抗。一九七四年九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在旅大召开了全国人防、城防工作座谈会，

叶剑英副主席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亲自修改了会议纪要。反党分子王洪文看到纪要后，乱批一通，破坏纪要的下发。我省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回来后向省委作了汇报，冼恒汉学着王洪文的腔调说：“大连会议纪要路线不对头”，“要等中央正式纪要下发后再执行。”以此扣压会议材料不让向下传达贯彻，公开对抗叶副主席。

(二)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大搞“反经验主义为纲”，打“土围子”，把专政矛头对准人民内部，指向党内。

一九七五年五月，省委常委和省级各部门负责干部举办学习班，冼恒汉在开始和结束时的两次讲话中，大肆鼓吹反动的“张春桥思想”。他以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为指导，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反对毛泽东思想。他胡说什么：“专政不仅是镇压，而且包括限制、改造和其它手段；专政不仅是对敌对阶级，而且也包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且气势汹汹地说：“还有的，你在那里大干，他就到处捣乱。吹冷风，告黑状，造谣中伤，诬蔑诽谤。这几年，这一类问题碰到的真不少，这到底是个什么问题？是个什么性质的斗争？学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实指学了“张春桥思想”），提到原则高度来看，这正是反映了农村中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占领与反占领的严重斗争，实际上是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也就是谁专谁的政的问题。”并借题发挥，攻击反映了农村一些真实情况的同志是“小生产者和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言

人”。还说：“这些阻力、障碍怎样排除？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一条，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从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看农业，问题就看不清，认识就提不高；不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去办农业，农业就办不好，就上不去。”在他的旨意下，全省许多地方办起了名目繁多的“学习班”，大整干部、群众，什么“有劳不劳学习班”、“懒汉懦夫学习班”、“两个决裂学习班”，等等，对群众轮番批斗，残酷毒打，有的逼死人命，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理论，紧密配合了“四人帮”在乱中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与此同时，冼恒汉还从张春桥那里拣来了“土围子”的帽子，到处乱戴，整了一些单位和一些革命领导干部。他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一次讲话中，胡说什么：“我们有的部门还有‘土围子’，是需要冲击一下。”并说：“十一冶本来是冶金建设战线上的一面红旗，由于领导班子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搞马克思主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企业，变成形式上的社会主义，本质上的资本主义企业，成了资产阶级的‘土围子’。他们招牌未变，名义存在，但是性质已变，红旗倒地。”十一冶的问题，本来由宋平同志主持早已作了妥善的处理。但是，冼恒汉却重新翻腾，无限上纲，指使他的亲信淮文璋亲自写按语，以省委办公厅《参阅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省公社一级，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冼恒汉之所以要把十一冶打成“土围子”，其目的就是要向反党分子张春桥邀功请赏，并借此大整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宋平同志。

(三) 积极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疯狂打击、诬陷叶副主席和邓副主席。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兰州铁路局有人抢先贴出大字报，批所谓“白猫黑猫”和“唯生产力论”，还影射攻击叶副主席在国防工业会议上的讲话。洗恒汉对这张大字报很赞赏，亲自给赵滔（原兰州铁路局党委书记）说：“这张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写的水平很高。”公开支持一些人反对叶副主席和邓副主席。

一九七六年一月，洗恒汉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时，反党分子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看望洗恒汉，对洗讲：“你们那里为什么不早一点儿点名批×？”洗回来后，立即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现在我可以在这个范围内点一个人的名，右倾翻案风是从邓小平那儿刮起来的。”洗恒汉这样迫不及待地抢先批×，是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紧密配合在一起的，是与“四人帮”订有默约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反党分子江青擅自召集十二省区负责同志开会，疯狂打击和诬陷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江青问洗恒汉：“你们那里怎样？”洗说：“批×反右对我们有利，不批×反右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江青说：“洗恒汉那里好，是顶住了的。”并说：“兰州铁路局是右倾翻案风的典型”，“铁路给你们翻身了”。洗听了后非常感激地说：“把历史颠倒过来

了嘛！”洗从北京回来后，不是认真传达、学习中央四、五号文件，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而是把江青的黑讲话作为运动的指导思想，并且指令把江青交给他的清华、北大《大字报选》向全省印发了一万六千多套。紧接着，在三月召开的省委五届六次全委扩大会上，他的总结讲话竟然把邓小平同志和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并列起来，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是“地地道道的翻案派、复辟派、顽固派”，是“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牛鬼蛇神的总代表”，是“最危险的人物”、“披着人皮的狼”。公开同中央打招呼会议和中央四、五号文件相对抗。洗恒汉在这次会上还布置他的亲信按照反党分子江青的腔调，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大肆攻击和诽谤邓小平同志。

天安门事件后，洗恒汉与“四人帮”推波助澜，批×步步升级，层层加温，在我省掀起一股大抓所谓“民主派”、“走资派”的阴风恶浪。他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说：“要把批×、反右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是大方向，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撤了×，不等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流毒就消除了，各级领导要不断解决批×的认识问题，切实加强领导，不断掀起批×新高潮”。他采取的加强措施：一是，由他亲自挂帅，成立省委运动办公室，并提出“每周向省委常委会汇报一次运动进展情况，重大情况随时报告，随时安排讨论”。二是，仿照毛远新的办法，以省委名义召开“理论讨论会”，“解决对×××恨不起来的问题，对走资派恨不起来的问题”。按照“四人帮”的框框，给走资派画像，强调什么“要

认识走资派的危险性、欺骗性、残酷性、贪婪性”，鼓吹“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阶级斗争的主要战场已由党外转入党内”，要研究“走资派为什么走，怎样走，在什么问题走”。他按照“四人帮”提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胡说什么“老干部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并指令他的同伙牟继荣和亲信孙炳先（原省委组织部长）、刘金泉（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对省直机关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摸底排队，调查谁是“已经变、正在变、不警惕也会变”的所谓“三变”和“三气未消”的干部，层层抓“民主派”、“走资派”。在省直四十八个单位中，要对二十九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动大手术”，把一批革命老干部挤出领导班子。三是，要求县委副书记以上干部人人都写批×反右文章，限期交卷。他在七月的一次会上还查问“现在究竟写了多少，要检查，要有要求，要抓紧”，并说：“甘报要多登批×的文章，登有份量的文章。”指令他的追随者秦彦章搞了《批×文章选编》，在报纸上大量登载批×文章，大量编印以批×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基本路线教育材料”。四是，抓试点，树样板，亲传密授“四人帮”的旨意，大搞批×先走一步。他在七月的一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什么“省上要搞好六个典型单位，要以总结经验为主，开经验交流会，互相促进”。类似这样的会议，全省开了八百多次。五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加快了阴谋篡党夺权的步伐，抛出了所谓批×的“三个小册子”，更加恶毒地攻

击和诬蔑邓小平同志。洗恒汉、秦彦章急如星火，下令印发三十七万余套，共一百一十多万册。洗恒汉在九月初的一次批×情况汇报会上说：“现在三个材料发了，批的东西很多，中心还是抓总纲，抓重点，抓要害，这是政治宣言。这些材料从头到尾不讲文化大革命，不讲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还说：“现在批三株大毒草，行动快的是少数，有些同志嘴上说批，但对修正主义的言行还认为香得很，并没有批。要通过批三株大毒草，解决好思想政治路线问题。”洗恒汉害怕批不起来，专门提出：“要把三株大毒草增发一些，要照顾给理论队伍多发一些，知青点要直接发到手。”还提出“要搞些通俗的东西，让广大群众都能看懂，特别是在农村要多搞一些对照起来批的材料。”在所谓的批×“三个小册子”还未正式下发之前，洗恒汉就在一次常委会上，诬蔑宋平同志在参加国务院长远规划会议时，参与了“工业条例”的起草工作，企图借此整宋平同志。

洗恒汉紧跟“四人帮”另搞一套，表现特别突出的是在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早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他就策划通过新华社兰州分社向中央谎报了所谓兰州铁路局搞“右倾翻案”的“内参”材料。当铁道部派政治部主任黎光同志来兰州向省委汇报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时，洗恒汉拒不接见，还布置他的亲信张恒云（原省委常委）、淮文瑄直接指挥兰州铁路局的一些人，围斗、绑架、摧残黎光同志。一月十一日，国务院通知铁道部，要黎光同志回京向周总

理遗体告别，冼恒汉和张恒云等不准黎光同志回京。当时，王震副总理先后两次亲自给冼恒汉打电话，让他出面做工作，不要围斗黎光同志，他置之不理，横蛮地顶撞王震同志。一九七六年二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华国锋代总理亲自处理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冼恒汉阳奉阴违，另搞一套，按照反党分子江青的调子，把铁道部根据中央九号文件对兰州铁路局的整顿，诬蔑为“复辟倒退的典型”、“右倾翻案风的缩影”。他在三月省委五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说，兰州铁路局的“五·九”会议，“出文化大革命的气，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和革命生产的大好形势”，是个“复辟事件”。三月十四日，冼恒汉在兰州饭店七楼会议室召集赵滔等人开会，专门研究批×反右“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他说：“反击右倾翻案风依靠什么？还是依靠斗争中出现的积极分子，这一部分人大体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方向对的。”还说：“为什么铁道部工作组来，一下子就复辟了？要找个经验教训。过去体会不深刻，这回可是给我们看了。这是好事，不然，我们还不知道复辟是什么样子呢！”七月初，冼恒汉在一次省委常委听取兰州铁路局党委汇报的会上，又规定了和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相对抗的所谓“方针”，他说：“分正确与错误应以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态度来识别。”还说：“现在走资派还在走嘛，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有些

人不转弯子，还要等待十年，这是什么问题？不转弯子，就是反对批×、反击右倾翻案风。”在他的指令下，省委工作组在兰州铁路局层层揪“民主派”、“走资派”，还揪什么“走资工”、“走资婆”，大搞所谓“换土壤”。全局局共调整各级党委班子九十四人，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四；调整各级班子成员二百三十名，占领导干部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三。调整各级干部达一千一百三十三名。按照“优先发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积极分子”的原则，突击发展党员二百六十一人，把许多有严重问题的人也拉入党内。在铲除“复辟的社会基础”的口号下，全局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共二千四百二十二期，有十一万九千八百多人参加，对持不同观点的同志，搞层层检讨，人人过关，造成了严重后果。冼恒汉还支持一些人大闹铁道部，冼的亲信张恒云勾结“四人帮”在河南的余党唐岐山，提出要“组织三千人去北京”，要给铁道部“写一千张大字报”，把部办公楼贴满，妄图整垮铁道部，给中央施加压力。冼恒汉在兰州铁路局搞的这一套，深得“四人帮”的赞赏。反党分子江青亲自布置她在文化部的黑干将到兰州铁路局写所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剧本。冼恒汉的亲信淮文瑄和吴天任（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赶忙具体策划，派人去上海观摩《盛大的节日》，到河南拜访唐岐山，并以反党电影剧本《反击》为蓝本，以兰州铁路局为题材，以唐岐山、李宗虎为模特，炮制了反动话剧剧本《战长年》和反动电影文学剧本《主要战场》，疯狂叫嚷“要同大的、省以上的走资派长期

战斗”。

在一九七六年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洗恒汉也是紧跟“四人帮”另搞了一套，特别是在他亲自抓的通渭县，表现的更为突出。六月，洗恒汉视察通渭时，大放厥词说：“批×、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全党的大事，一定要摆在头等位置，抓紧抓好。批×和路线教育是一码事，没有什么矛盾。我们同×××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当前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就是要通过批×来进行。×××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挂帅人物，我们要反修防修，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不批×怎么行呢？”并且大肆鼓吹“四人帮”的“阶级关系新变化”，到处煽动抓“民主派”、“走资派”，说什么：“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党内成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激烈搏斗的主要战场，党内走资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并且咄咄逼人地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整天喊要抓阶级斗争，要批资本主义，到底资产阶级在哪里？整天喊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到底谁在搞修正主义？”强令工作队和县、社党委“不能回避这个矛盾，有问题就是要揭开”。在他的煽动和布置下，通渭县到处批“民主派”、“走资派”、“保守派”、“投降派”、“寄生虫”、“应声虫”、“蛀虫”，等等，抓“猫书记”、“猫队长”。洗恒汉以他抓的通渭县为样板，不断总结所谓“典型经验”，在全省推广，造成了严重恶果。

三、培植资产阶级帮派势力，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建立组织基础。

洗恒汉极力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以帮划线，唯帮是亲，包庇、重用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打击、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直接配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一) 在省委内部拉帮结派，搞凌驾于常委之上的“小核心”和“小常委”，指派亲信严密控制要害部门。

洗恒汉紧跟“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在省委内部笼络亲信，结帮篡党，组成“小核心”、“小常委”。全省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先由“小核心”、“小常委”私下策划之后，然后拿到省委常委会上，或强行通过，或隐瞒真相走走过场。洗恒汉还把他的一些亲信安插到要害部门，严密控制，为其帮派利益服务。省委办公厅的大权由蔺进生、淮文瑄等所把持；省委组织部的大权由孙炳先、刘金泉、路玉明等所把持；省委宣传部的大权由秦彦章、朱培屏（原省委常委）、吴天任所把持，又指定蔺进生、淮文瑄分管宣教口的工作；省农办、省公安局、甘肃日报社、广播电台等部门也派了他的亲信严加控制。另外，他还在省级一些单位和地区培植亲信，安插“直属干部”，以巩固其帮派统治。靠这些人经常为他递送“小报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百般挑

刷，妄加罪名，为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提供“炮弹”。

(二) 大搞“双突”，包庇、重用“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所谓“新生力量”，扩充帮派势力。

洗恒汉在全省范围内，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甚至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拉入党内，提为干部。他胡说：“我们现在依靠谁？就是要依靠造反派，……就是要找造反派，找别人，人家会骗你，不给你说实话。”由于他积极推行“四人帮”“闹而优则仕”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将许多为非作歹，闹得最凶的人，以“新生力量”为名拉入党内和干部队伍，造成了一些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严重不纯。

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宗虎紧跟“四人帮”，干了许多坏事。洗恒汉却说李“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叫李参加党的“九大”。李去北京的前一、两天，洗硬逼铁路局党委解决了李的党籍问题。兰州铁路局“五·九”会议免了李宗虎的职务，洗恒汉说他们不要我们要嘛，省上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洗特意走过去和李握手，表示安慰，并拍着李的肩膀说：“现在摘了你的小乌纱帽，我给你再戴个大乌纱帽。”立即任命李为省机械局副局长兼礼县县委副书记。群众来信向省委控告李的一些严重罪行，洗又极力掩盖包庇。一九七六年初，李宗虎回铁路局后，有一次省上开会，洗走到李面前问：“怎么样吗？”李感恩戴德地说：“这一次不是你支持，我的日子

确实不好过了。”

省革委会副主任李荣山，紧跟“四人帮”，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打击、迫害革命领导干部。洗恒汉却说：“李荣山几年来和我们合作得很好。”指令兰化公司党委解决了李的党籍问题，并把李提名为“九大”代表。在省五届党代会上，又把李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并任命为兰化公司党委副书记，充当了他搞乱兰化的得力打手。

省革委会常委许存贵，紧跟“四人帮”，靠“打砸抢”起家。洗恒汉不顾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指令兰石厂军管会把许强行拉入党内，任命为厂党委副书记，并推荐为“四届人大”代表，窃取了人大常务委员职务。

省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路玉明，先后在武都、临夏、定西等地工作期间，拉帮结派，吹牛浮夸，搞瞎指挥，品质很不好，干部群众极为不满。洗恒汉包庇重用，调到省委和他的亲信孙炳先、刘金泉一起控制干部大权。

原兰州市城关区委书记××，犯有严重错误，在群众中反映强烈。洗恒汉不但不严肃处理，还提拔使用。

原省革委会常委陈国政，持枪逼奸妇女，大搞打砸抢，行凶杀人，罪行累累，理应依法严惩，但因“陈不反洗”，就被洗恒汉长期包庇，逍遥法外（现已捕办）。

(三) 制造分裂，依靠亲信，打击、排挤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省委领导同志。

胡继宗同志在世时，洗恒汉对胡继宗同志极力排斥。一九六九年一次省革委会常委会议开会前，洗恒汉在徐国珍（原省委常委）、姚树荫（原省委常委）、胡定发面前攻击胡继宗同志说：“胡继宗为什么跟汪锋跑、保汪锋呢？……他喜欢汪锋搞的那一套，他跟我们不一心。”成立省革委会时，结合了胡继宗同志，但洗并不信任他，当时，省委的主要报告都由别人出面去作。胡在北京养病期间，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请华国锋同志转交。但这份报告被洗恒汉得知后，竟诬蔑胡支持“兰州地区工人批林批孔联络站”。洗把胡继宗同志从北京叫回来，让他交代与“联络站”的关系，妄图把罪名加在胡的身上，攻击胡继宗同志搞宗派活动，派人监视。

一九七四年七月，胡继宗同志病故后，洗恒汉一手策划，把不学无术、善于投机钻营、积极投靠“四人帮”、在礼县民愤很大的所谓“先进代表人物”年继荣调到省上，大肆吹捧年继荣是什么“老先进”、“年轻，有实际经验”、“何家庄的工作搞得很好，礼县也搞得不错，在我省学大寨起了带头作用”，并说年“可以在省上主持工作”。洗恒汉不顾其他省委常委的反对，坚持要把年继荣提为省委第二书记。同年九月份，他急急忙忙地盗用省委名义向中央送了年继荣任第二书记的请示报告，洗还在报告中亲笔添了常委“一致同意”、“早日”批复的字句。虽然中央没有批准年继荣任

第二书记，但洗恒汉实际上仍让年掌管全面工作，以此贬低和排斥宋平同志。

洗恒汉在省委常委内部信用年继荣和另外几个亲信，对宋平同志和其他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省委领导同志，极尽打击、诬蔑、排斥之能事。洗恒汉曾在他的亲信王国瑞（原省委常委）面前诬蔑说：“宋书记抓生产多，抓路线少。”还扬言要“撤销工办，改组计委”。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洗恒汉在一次大会上借批郭坦（原省工办副主任）、苏华（原兰州铁路局局长）等同志，影射宋平同志。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洗恒汉去河西以后，宋平同志研究提出，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要抓一下工业基建和农副产品收购的正确意见。电话请示他，他立即向常委写信横加斥责，并给加上什么“破坏和干扰农田基本建设”的罪名。一九七五年，宋平同志参加国家计委长远规划会议，洗恒汉趁机造舆论说：“宋平同志可能调走，调走也可以嘛！”与此同时，洗恒汉又积极支持兰化公司李荣山等人攻击、迫害省委常委李超伯同志。今年初，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以后，洗恒汉又到处散布宋平同志的坏话，妄图把他在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所犯的严重路线错误强加在宋平同志身上。

(四) 以各种卑劣手段打击、迫害革命老干部和持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

一九七五年，洗恒汉的亲信孙炳先从北京开会带来一份毛主席

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传抄稿，他看后，一不相信，二不理睬，继续到处散布老干部“表现不好”、“右倾保守”、“作不了多少工作”，并诬蔑一些老干部是什么“走资派”、“吐故对象”，公开提出要老干部“让贤”，胡说什么要“砸烂旧机器，建立新机构”。文化大革命以来，原省委常委和副省长以上干部二十一人，结合进省委、省革委会的仅有三人；原省委各部、委、办的负责人近三十人，任原职的只有一人；原地、市、自治州委的一把手，任原职的只有二人；原省级各局负责人，安排使用的仅占一半，其中三分之一降职使用。有些同志的问题，本应早作结论，他久拖不决，甚至歪曲事实，有意陷害；对有些应该安排工作的同志，他不予安排，让他们长期待分配；对有些还可以工作的老同志，他以种种借口强令退休。

原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问题早已查清，但洗恒汉不予解放安排工作，竟然放到劳改农场看管起来。邓小平副主席一九七五年专门批示要妥善安排汪锋同志的工作。洗恒汉公开对抗，甚至对邓副主席发泄不满地说：“汪锋上台，我就下台。”他还和年继荣一起策划，指派其亲信孙炳先、刘金泉等人暗中对汪锋同志监视，搜集所谓“动向”，多次点名批判。一九七六年二月，洗恒汉借贯彻中央〔1975〕23、26号文件向中央写报告的机会，又点名攻击了汪锋同志。当时，宋平同志提出不同意见，洗置之不理，一意孤行，签发上报。原省委书记裴孟飞同志，被洗恒汉加上所谓“二套

班子”总头目的罪名，送往农场，残酷迫害，身患癌症后也得不到及时治疗，致使含恨而死。原省委书记高健君同志，在军管审查中被惨遭拷打。原省委书记王世泰同志是在中央指示后，洗恒汉迫不得已才将王安排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有职无权。原省委书记李友九同志，一九七二年被派任平凉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在地委没有职务，中央提出意见后，洗迫不得已才任命李为地委书记。一九七六年因李友九同志在粮食问题上提了不同意见，洗恒汉竟说李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支持平凉地区有的人整李友九同志。原省委书记马继孔同志被派任甘肃工业大学革委会主任，洗恒汉多次派人到工大搞马继孔同志的黑材料。原省委常委丁乃光同志，文化大革命前来甘肃工作只有三年，“审查”就搞了十年。一九七六年，因丁传抄了毛主席对电影《创业》的批示，就被洗当作“谣言”加以追查，围斗批判了一个多月。原省委常委韦明同志，被扣上所谓“汪锋一小撮”等帽子，“审查”了七、八年之久。原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张北华同志的历史早经中央审查结论，肯定了张北华同志在被捕期间进行绝食斗争是正确的。洗恒汉歪曲事实，硬要把张北华同志打成叛徒。张患瘫痪病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就在张重病之机，还派人到医院向张宣布所谓的“审查结论”。

洗恒汉根本听不得不同意见，对给他提批评意见的同志，无限上纲，打击报复。原省工办副主任郭坦同志，根据省委领导同志指示去铁路局了解了有关情况，还向省委提出给工办选调几个干部，

便被扣上“诬蔑大好形势”和“复旧”的帽子，受到批判。当中央要调郭坦同志去武汉铁路局工作时，洗恒汉又故意刁难，还要继续批斗。一九七六年初，省建委副主任呼育之同志对洗恒汉的思想工作作风提过一些批评意见，洗恒汉立即批示说，呼育之同志“把矛头指向了省委”，“不怀好意”，指令他的亲信蔺进生组织力量，将呼育之同志批判了很长时间。洗恒汉不仅对许多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容不得，就连一般干部和群众也不放过，如果对他稍有触犯，也必置欲死地而后快。阿干煤矿的高华同志，因为对洗恒汉、孙炳先、刘金泉等人不满，曾多次向华主席写信作了反映。对此，洗恒汉无比仇视。一九七六年七月，他在听取年继荣关于处理高华问题的情况汇报后，在省委常委会上气势汹汹地说：“这不是高华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孤立的问题，……他代表落后复辟势力，这是坏人，不是好人”，“对高华要批，一条一条批，要强制他劳动”。事后，洗恒汉和他的同伙年继荣授意淮文璋等人公然对抗华主席的指示，捏造假情况，欺骗中央领导同志。一九六九年，省物资局干部袁自立向中央写信，反映了洗恒汉等人不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洗即指使孙炳先、刘金泉到处追查，捏造了个所谓“反革命告状团”的罪名，大搞逼供信，一个被关进监狱，两个被迫自杀，三百多名干部受到打击和迫害，造成骇人听闻的冤案。

四、全面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给各条战线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

洗恒汉步步紧跟“四人帮”，事事按照“四人帮”的黑旨意去办，顽固地对抗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各项指示。

在农业上，洗恒汉伙同年继荣、禹贵民等人，猖狂反大寨，反两次“全农”会议精神，反中央领导同志对甘肃农业的重要指示，推行了一条同大寨道路完全相反的办农业的错误路线，严重干扰和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早在一九七一年，他就狂妄地攻击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在一次讨论农业问题的省委常委会上，他诬蔑大寨，说什么：大寨欢迎人参观就是“把大小便留下，可以多积肥。”大寨生产搞得好的是“种玉米、高粱等粗粮，产量就上去了。”公开与大寨的根本经验唱反调，不让人们学大寨。

敬爱的周总理非常关心我省人民。一九七三年五月，宋平同志向周总理汇报了甘肃中部地区人民生活困难的情况，周总理听后非常难过，对改变我省中部干旱地区面貌作了重要指示，严肃地指出：二十多年了，那里的人民还没有饭吃，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心里很不安。周总理还充满信心地说，中央一定帮助你们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并当面指示洗恒汉，要使中部干旱地区三年发生一个大的改变。紧接着，一面派出工作组深入我省中部干旱地区调查

研究，一面又拨出大批救济粮、款和物资帮助中部地区人民，使灾区人民深受鼓舞，感激万分。可是，洗恒汉对宋平同志的汇报十分不满，认为是给他脸上抹了黑。他竟然长期封锁周总理的指示，拒不贯彻执行。当有的同志提出省委对中部干旱地区工作要加点油时，洗恒汉竟说：“加什么油，油都加干了！”胡继宗同志知道总理的指示后，表示要严肃对待，认真作出贯彻措施，并建议于一九七四年元月召开了省委第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胡继宗同志起草了一个讲话，从路线的高度来检查甘肃的农业问题。讲话稿送他审阅时，他不同意发，还诬蔑胡继宗同志是“否定甘肃大好形势”、“不相信群众”、“夸大困难”等。一九七三年九月，陈永贵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到我省视察，介绍了大寨经验，作了许多重要指示，还中肯地指出：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农业要上去，不在条件在路线。洗恒汉根本听不进去，并且极力贬低陈永贵同志，诬蔑陈永贵同志“只能介绍经验，管管小范围内的农业，没有管全面工作的经验”。

英明领袖华主席也非常关心我省农业和人民生活，一九七四年五月在听取宋平同志等汇报甘肃农业问题时，又作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但洗恒汉既不向下传达，又不认真研究，并以假情况欺骗中央。今年五月，李先念同志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期间，召集各省代表团长座谈时又明确指出：“对甘肃农业始终不放心”，“甘肃的大寨县吃回销粮是怪现象”。对这样严肃、尖锐

的批评，宋平同志及时地传了回来，但洗恒汉却不满地说：“就是放心不下嘛！因为我们还是靠天吃饭。”紧跟他的禹贵民竟恶狠狠地说：“对我们放心不下，对四川就放心得下？”

洗恒汉反对毛主席树立的大寨红旗，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但是他自己却大树假典型，乱发黑指示，干扰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他的同伙年继荣发迹的礼县，是他非常赏识的所谓“学大寨先进样板”，并亲自指派其亲信姚树荫长期在那里“坐阵指挥”。为了与大寨唱反调，与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相对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由洗恒汉一手策划在礼县召开了全省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他在会上闭口不讲中央领导同志对甘肃农业的重要指示，不讲大寨经验，不讲农业学大寨，却大肆吹捧小靳庄，大肆吹捧何家庄大队，叫嚷什么“从礼县看到了甘肃的希望”，“给了甘肃解决农业问题的信心和办法”。胡吹这次现场会是甘肃农业发展的“转折点、里程碑”。去年七月，洗恒汉又指派禹贵民召开了第二次礼县现场会，继续鼓吹学“小”不学“大”，学“何”不学“大”，在礼县街道上用大幅标语写着：“向小靳庄学习”、“向何家庄学习”。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不学大寨反大寨，积极投靠“四人帮”的反动实质。洗恒汉为了大树礼县假典型，硬要把礼县塞进一九七四年的广交会参加展出，省委常委讨论时，有同志提出礼县产量低、贡献小，从七一到七三年，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不同意参加，但洗不顾事实，说：“要看政治方向，礼县学大寨学得早，在我省

起了带头作用。我们省不树礼县村谁？”后因农林部不同意，最后才换成别的县。一九七五年第一次“全农”会议期间，农林部来电话，要我省推选学大寨的先进县参加全国学大寨会议展览。洗仍然坚持要把礼县报上去。在提交省委讨论时，当有的领导同志指出礼县粮食产量没上《纲要》，口粮只有三百斤左右，工值只有二角四分等问题时，洗气极败坏地说：“我们办事的人和我们想不到一块儿！”我省第一批树立起来的九个学大寨先进县中，有四个吃回销粮，五个发放救济款，大寨县还有讨饭的人，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洗恒汉对党在现阶段的农村经济政策，也推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九七二年，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根据中央农村经济政策座谈会精神，通过调查研究，搞了个适合甘肃农村的二十二条。他根本不支持，而以“中央已有规定”、“不能标新立异”为借口，不许下发。以后下发了个草稿试行又收回作废。但是，他却对原庆阳地委书记×××写的否定“六十条”的《是人民公社万岁，还是生产队万岁》的报告很感兴趣，立即加写批语转发下去，在全省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不少地方刮起了一股收自留地、合并核算单位、不准社员私人买架子车、不准个人养母猪，搞所谓“割私有制尾巴”的歪风。中央明文规定现阶段现金全部按劳分配，洗恒汉却紧跟“四人帮”，借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强行推广礼县搞的现金按人劳比例分配的

“经验”，要各地试行。毛主席指示“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洗恒汉胡说：“甘肃不购过头粮没条件”，致使我省购过头粮的问题长期严重存在。“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毛主席提出的伟大战略方针，洗恒汉却胡说“河西不需要搞储备粮”。我省是全国十大牧业省之一，洗恒汉却随意改变牧区以牧为主的方针。一九七二年把著名的牧业区天祝县改为以农为主，破坏草原五十多万亩。一九七三年省委牧区工作会议定了甘南的生产方针，要求落实到社队。州委把一些队转成牧业队后，洗恒汉又批评州委胡搞，说什么“甘南粮食为什么上不去，光吃肉行吗？”搞得下面无所适从，生产变来变去，致使甘南州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六年牲畜死亡达一百九十多万头，相当于全州一九七六年牲畜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平均每年二十八万多头，占当年总数的百分之十二以上。由于洗恒汉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严重影响了集体收入，影响了社员的生活。一九七六年全省穷社穷队大大增加。现金分配一九七六年和七五年相比，人均收入四十元以下的生产队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占总队数的百分之四十六。口粮分配一九七六年和七五年相比，人均口粮减少了五十九斤半，只有二百九十六斤半。到今年初，全省有百分之六十六的县、百分之五十的生产队，近八百万人吃回销粮。一些受破坏严重的县，人口大量外流，有些社员出现浮肿、干瘦，个别地方发生了人员非正常死亡。在工业上，洗恒汉反对“鞍钢宪法”，破坏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

动,他把加强企业管理诬为“管、卡、压”;把关心职工群众生活诬为“物质刺激”;把强调技术责任制诬为“专家治厂”;把革命的企业整顿诬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复辟”;把石化部一九七五年在我省召开的“两兰”现场会诬为“抓耗子的会”,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给轰轰烈烈的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泼冷水,设障碍。他还积极支持他的打手李荣山紧跟“四人帮”,在兰化大批“唯生产力论”,妄图夺兰化党委的权;支持、宣传兰炼张军(研究所总支书记)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与石化部“对着干”。他按照“四人帮”的旨意,在兰州铁路局支持赵、张、李、顾与铁道部“对着干”,搞乱兰州铁路局,使铁路运输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四省区的革命、生产和人民生活。他和他的同伙年继荣等人直接插手省燃化局、刘化、盐化、敬东厂、酒钢、金川公司等单位,搞乱了领导班子,搞乱了职工思想,使这些单位长期不得安宁。今年以来,石化部对兰化、兰炼、燃化局的领导班子,冶金部对金川公司、白银公司的班子,二机部对五〇四厂的班子有意见,其他部也有反映,洗恒汉根本不理睬,继续一意孤行。

在财贸工作上,洗恒汉极力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使我省的财贸工作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经营管理方面,他反对加强企业管理,主张“吃大锅饭”,不计成本,不讲核算,乱批“利润挂帅”,致使不少企业管理混乱,成本上升,积累下降,亏损增加,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

收入。仅一九七六年全省的亏损企业就有一百八十多个,亏损达二亿五千多万元。从去年六月至今年六月,由于洗恒汉竭力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铁路堵塞,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年六月份,迫使一些企业因原材料供应不上,而停产或半停产,只此一项就减少国家财政收入二亿多元。在市场供应方面,他不看急需,不顾长远,漠视人民群众的生活安排,破坏国家商品计划供应,致使许多应该调进的商品调不进来,应该运出的商品运不出去,造成进出停滞,严重影响了市场供应、人民生活和外贸出口。仅今年春节前后,就有急需的粮食、副食、医药、化工、百货、食糖等商品三万五千多吨运不进来,又有许多商品运不出去。许多工业品下不了乡,农副产品进不了城,影响了城乡经济交流,破坏了工农联盟。洗恒汉还违犯国家财经制度,破坏国家财政纪律,利用职权乱批、乱供国家物资,严重扰乱市场,助长不正之风。

在计划工作上,洗恒汉极力歪曲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片面强调农业投资越多越好,谁要是持有不同意见,他就诬蔑谁是搞“重轻农”,严重破坏了计划工作,搞乱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他到处支持乱上项目,冲击国家计划内的建设,据初步清查,仅一九七六年全省计划外的项目就有七百一十六项,需要投资五千五百多万元。宋平同志向国家计委要求我省拟上引大入秦、景泰二期、兴堡子川三大工程。国家计委指示要搞个规划,逐年上。这个意见宋平同志当即告知了洗恒汉,但洗在景泰二期、

兴堡子川未列入国家计划、工程无设计的情况下，硬要和引大入秦同时上。省计委再次向他汇报时，他也同意逐年上，但背后又支持县里先开工。在省委讨论时，宋平同志提出“这样大的工程要先搞好设计再动工”的意见，洗就马上以“上与不上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帽子压人。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搞楼堂馆所，但洗恒汉却背着主管书记宋平同志，支持酒泉地委和酒泉县委有的人修计划外的大剧院。对此，省计委、建委联合调查组向洗作了汇报。洗说：“只有你们计委的计划才算计划，地方的计划也算计划嘛！”还指责说：“你们计委管计划管得太死了。”公开对抗中央指示，破坏国家计划工作。

在文化教育和科研战线上，洗恒汉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文化教育方针和科研路线。洗恒汉等人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在全省上下大写、大画、大演所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和剧目，仅这类剧本和曲艺节目就有一百三十三个，其中不少政治思想内容都是十分反动的。相反，对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他们却不准传达，并且以“小道消息”、“谣言”进行追查。他们把兰州大学作为学习清华、北大的典型，“动大手术”，撤换校系领导百分之八十，超过了清华大学。总结推广兰大“经验”，流毒全省。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答卷”和“梁效”的黑文章编入中小学教材，毒害青少年。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大砍大杀科研机构，挤走大批科技人员，严重干扰破坏了我省科技事业的发展。

展。

五、同“四人帮”一样，大耍资产阶级官老爷作风，称王称霸，高高在上，蛮横无理，弄虚作假，严重脱离群众，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

洗恒汉学着“四人帮”的样子，肆意践踏党的组织原则，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省委工作中许多重大问题，根本不拿到常委会上讨论，有的虽然提到常委会上讨论，但事先不通气，不与有关负责同志商量，常常在会上搞突然袭击；有的是常委会上决定了的问题，不遂他的意，他可以随便推翻。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份，省委常委会决定报请中央安排几位老同志到省委和省革委会工作，会后，他又私下向中央组织部要求不要批复，擅自推翻常委决定。到一九七六年二月，年继荣还不放心此事，又问他，他说：“我已经把它吹了，还批什么！”许多重要干部的任免、调整事项，他都不与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很好商量，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一九七五、七六年省委两次免去安西县委书记×××的职务，×××给他写了几封信要求留任，他就推翻了省委决定，让×××继续任安西县委书记。还有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搞“第二武装”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抓捕房廷梁等三同志的问题等重大事情，洗恒汉都是背着省委，伙同他的个别亲信干的。

洗恒汉一贯弄虚作假，不实事求是，讲大话、空话、假话，大

搞瞎指挥，形而上学猖獗。一九七五年武都县曾有人向中央反映，群众生活困难、缺粮吃，农林部一位负责同志来我省，提出要到武都去看一看。但是洗恒汉却故意把这位负责同志介绍到了武威。这位负责同志到武威，经过调查了解，发现不存在缺粮问题。当他知道自己所到的地方不是他要去的的地方时，已时过几天，终因其他工作忙，没有去成武都。同年十二月间，洗恒汉到民勤县看农田基本建设搞的不错，当时县委已经写好一个总结农田基本建设经验的材料，准备登报。他的亲信淮文璋看了这个经验材料之后，提出硬要把民勤人民的的成绩说成是由于这次洗恒汉来民勤促上去的，一定要县委把这个内容写进去，借以吹捧洗恒汉。一九七五年十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提出要大搞普及大寨县运动，洗恒汉认为这是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好机会，当参加会议的代表回省不久，他就在一次会上表示要去通渭县“抓点”。他煞有介事地说：“人说通渭没治，我来治治看！”于是，洗从十一月中旬开始就把通渭作为他的“点”来抓了。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至七六年底，他“抓点”的一年多时间内，先后只去过通渭两次，总共只有八天时间。每去一次都是浩浩荡荡，前呼后拥，一天跑了几个公社，飞车跑点，坐车看花。每到一公社就把干部、群众忙成一团，弄吃的、安排住的、警卫的、招呼车辆的，闹得鸡犬不宁。在“抓点”中，他还学着“四人帮”装模作样地参加“劳动”，让记者又拍照片，又发消息，在报纸上、广播上大肆宣传，给自己脸上贴金，树碑立传。在他“抓点”

的一年中，通渭粮食总产由头一年的二亿一千一百六十七万斤，下降为一亿六千四百一十二万斤，还低于一九四九年的产量。致使从去年以来，全县吃返销粮一千万斤。洗恒汉却大肆吹嘘去年通渭粮食总产“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做到了自给有余”。一九七五年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中，洗恒汉不分具体情况，指挥许多地方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搞农田建设，中央水电部领导同志发现这个问题，认为这样搞费工、费粮，容易搞平调，在质量上也有问题，给省委打来电话建议应该因地制宜，不要强求各地一律这样搞。洗听后大为不满，不仅未认真改正他的瞎指挥错误作法，反而认为是在“泼冷水”，致使一些地方农田基本建设进度慢、质量差，浪费了人力物力，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

洗恒汉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心目中根本没有人民群众。他每次下地、县，都事先打电话通知地、县负责同志，每到一地，负责同志都要在几十里外的县界迎送。一九七三年，他外出路过张家川县，到天已经晚了，原计划在县上住宿，县委同志把房子收拾好了，洗到房里转了一圈，嫌房子不好，一句话没说，坐上小汽车就跑了。一九七四年秋季，洗恒汉又去张家川钢铁厂检查工作，给县武装部打电话说要在县上吃饭，武装部未通知县委，县委没有准备，洗来了以后，马上就要吃饭，弄得县上同志措手不及，赶紧给搓些面条吃，他很不满意。走了以后，他给地委打去电话问：“张家川是什么人掌权？”并要派工作组来“解剖”张家川县委。

一九七三年六月，他伙同年继荣、蔺进生等去临潭县，在他们停留的三个多小时里，吃了一顿饭，睡了两小时午觉，县委汇报工作，他很不耐烦地听了几分钟，只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他们睡午觉的时候，县革委会院子戒备森严，一般干部不能随便走动，树上的乌鸦要赶走，停在门外的一辆手扶拖拉机要让人推到远处去发动。他们喝的水，也是自己车上带来的。这种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资产阶级老爷作风，给临潭县群众留下了极坏影响。一九七五年洗恒汉去永登县检查工作，事先组织了一个民兵连，沿途化装便衣搞警卫，另外派了一名县委常委亲自到兰州拉了生活用水、茅台酒，吃了一顿饭花了两个小时，结果听工作汇报只用了十分钟。

洗恒汉在生活上贪图享受，吃喝玩乐。自一九六八年省革委会成立近十年来，他很少到过机关大楼，吃住、开会、办公都在宁卧庄招待所，一个人独霸一幢楼，根本不与干部、群众接触，省委和省革委会机关许多工作人员，多少年来还未见过洗恒汉的面。在宁卧庄招待所，他和他的亲信霸占高级房间、会议室等，仅房租费一项，就挥霍国家资金一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元。每年用于他们烧水、取暖、洗澡、游泳耗费的煤料约计一千六百多吨，价值六万余元。洗的伙食费用按规定每天交一元五角，实际就餐标准大大超过，洗的早餐银耳枸杞汤，还有酱牛肉、蛋条、油煎鸡蛋清等，仅一顿就价值二元左右。几年来，在宁卧庄共放映故事片二百四十五部，新闻片一千八百六十一本，其中有不少是封存影片。共欠片租费二万七千四百元，欠

场租费一万四千八百四十元。他生活糜烂，道德败坏，臭名远扬，引起群众极大愤恨。

六、对抗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极力破坏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洗恒汉投靠“四人帮”，积极参与“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跟得紧，陷得深，罪行累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人心大快。但是洗恒汉的思想感情和立场一直没有转变过来，仍然顽固地站在“四人帮”一边，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压制和破坏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一九七六年十月，我省军民热烈欢庆两个伟大历史性胜利大会给中央致敬电的文头上，洗恒汉只准提党中央，不准提英明领袖华主席。中央打招呼会议回来，他借省委庆祝粉碎“四人帮”举行宴会之机，大放厥词，笼络人心，向他的亲信等举杯祝酒说“甘肃的形势好，也有你们一份功劳”，暗示不要揭发他的问题。十月十七日，洗恒汉又召集省委、省革委会中的青年常委开座谈会，大造自己没有问题的舆论，说什么“我们甘肃穷，‘四人帮’看不上”，“揪出‘四人帮’，我们都没有转弯子的问题，我们的班子是团结战斗的”，“‘四人帮’是‘四人帮’，甘肃是甘肃，我们没有问

题”。还煽动这些青年干部说：“你们要注意阶级敌人还要挑拨离间的，你们看文化大革命上来的，中央的都打下去了，你们也快了，要警惕”等等，公开为“四人帮”喊冤叫屈，攻击华主席。

同年十月二十日晚听取铁路局工作汇报的省委常委会上，洗恒汉根本不提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根本不提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自始至终强调不能借批“四人帮”“翻×××的案，翻兰州铁路局的案”，还提出“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转移批×、反右的大方向”，并咬牙切齿地说：“人家还没有传达，你就到处贴，这是革命吗？”“这是破坏中央的部署”。长期受压的兰州铁路局广大职工怀着对“四人帮”的无比仇恨，贴出了油炸、火烧、枪毙“四人帮”的大幅标语，洗对此横加指责，辱骂群众“这不是我们的语言！”“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语言！”要铁路局组织力量马上覆盖。洗的亲信蔺进生也跟着叫嚣“批×时你们为什么不提枪毙×××！”真是狂妄之极。不久就指派他的同伙年继荣率领工作组，前往铁路局镇压。十月二十四日，洗恒汉签发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省委发的第一个通知，别有用心地规定了“三个不准”，即“不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不准翻批林批孔的案，不准翻批×的案”，以后还加了一个“不准翻铁路局的案”，“不能搞扩大化，不能层层乱揪乱斗”，企图以此把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压下去。十一月下旬，洗恒汉借口组织兰州地区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为名，要压铁路职工，布置发言的人

都要写铁路问题，别的同志不同意，他大发雷霆，点名逼大家表态。而且安排赵滔、张恒云在会上“亮相”，压制铁路职工揭批他们的问题。

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洗恒汉又在全省宣传工作座谈会结束的讲话中，攻击和诬蔑揭发他的问题的群众，说什么“在传播的小道消息和谣言之中，有些矛头是直接对着省委的，对省委领导进行人身攻击，挑拨省委内部的关系，破坏省委的威信”，“我看是不怀好意的，他们想要干扰破坏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想要分裂我们省委，想要把我省的大好形势搅乱，这完全是白费气力，枉费心机的，肯定是不能得逞，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威胁群众。

同年十二月，洗恒汉为了进一步镇压铁路职工揭批“四人帮”和他的问题，与他的亲信蔺进生等人亲自策划了一个“一、二、三”的阴谋活动。即决定把他的亲信白俊山（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派去铁路局任党委书记；又以“根据本人要求”为名，将李宗虎、顾柏年免职调出铁路局让去外地休息，企图缓和矛盾，稳住阵脚；继而又背着省委常委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的房廷梁等三同志，抓起来关进监狱。他的亲信蔺进生亲自替铁路局党委炮制了所谓铁路局三十七号文件印发全省，要普遍传达。十二月八日，蔺又以省委名义在兰州地区开了千人大会，虚构事实，捏造罪名，向全省人民下了镇压令。

国家体委告诉甘肃省委，庄则栋来兰州搞阴谋活动，是奉王洪文的旨意来的，这个情况印发了常委，冼恒汉耍赖，说他不知道。

今年一月，华主席、党中央叫他去研究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纠正他的错误时，冼恒汉避而不谈“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检查自己的错误，顽固坚持错误立场，把铁路局的问题归咎于铁道部刮所谓右倾翻案风留下的后遗症。他的这些错误观点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严厉批判。在中央领导同志的耐心帮助和教育下，整整磨蹭了一个月，他才勉强挤出“三个一点”的检查，即所谓转弯子面大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调动干部多了一点，实在不象样子。最后在给中央起草报告时，他坚决反对写上“铁路局党委有的领导同志，主要是李宗虎、顾柏年同志在‘四人帮’反动思想影响下，违背‘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这段话，直到把这段话勾掉，他才签了字，这说明他对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害怕到何等程度！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查清“四人帮”的罪行，通知各省要将“四人帮”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指示、谈话记录稿搜集上报中央专案组，冼恒汉目无中央，拒不写材料，并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假报告，欺骗中央说，我省没有和“四人帮”谈话的记录稿。

今年二月，省清查办公室的同志提出应由省委主持，召集常委和有关人员讲清中央二月通知中要求讲清的问题，并报告中央，冼恒汉根本不理。

华主席、党中央为了彻底解决铁路局的问题，派来了中央帮助工作组，并且明确规定工作组在省委领导下进行工作。但冼恒汉对华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阳奉阴违，表面上拥护，实际上抵制、反对。对工作组不仅不支持，反而处处刁难，甚至发动一些人影射，攻击中央工作组。工作组写给中央的报告送他看，他拒不签字；省委传达中央召开的铁路工作会议，他借口有病躲在医院不参加，在宋平同志和中央工作组领导多次约请下，才勉强到会讲了几分钟的话，连一句揭批“四人帮”的话都没说；会议给华主席、党中央草拟一个电报，他不签字，使电报不能及时发出；经常与其亲信蔺进生、淮文瑄等攻击中央工作组，散布什么中央工作组“把铁路局搞乱了，还想搞乱省委”，“工作组不服从省委领导”等等。

今年三月，冼恒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回来后，他带的文件、会议简报不给其他常委、书记看，却把一个中央已经收回，他专门手抄的会议召集人名单给其他书记、常委看，妄图以此来证明他没有问题。

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省委常委扩大会上，宋平、黎原、李际祥三位领导同志就“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兰州铁路局的问题进行了揭批，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可是，冼恒汉不仅不表态，还强令将这三同志发言的简报收回，不准下发。李超伯同志揭发了冼恒汉的打手李荣山及其“小别动队”给“四人帮”写效忠信、劝

进书，妄图夺兰化党委的权，搞垮兰化的罪行，他不让发会议简报。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铁路局广大职工联系实际揭发洗恒汉紧跟“四人帮”，积极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罪行，贴出了不少大字报、大标语，他特别恐慌，在三月三十一日晚的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诬蔑这些大字报“不代表铁路局广大干部和职工，他们是极少数。”“我想他们的本意，就是要干扰会议，转移斗争大方向，转移不了，就干扰你一下，……省委到底是怎么回事？洗恒汉到底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讲话中已经有这方面的回答，……华主席在讲话中说，调整加强了十几个省的领导班子，二十九个省、市的第一书记已经都有了，我们没有在调整加强之内，还是原班子嘛”。歪曲华主席的讲话，掩盖他自己的罪行。洗恒汉还在一次会上公开造谣说：“中央组织部郭玉峰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我说，你们那个省委班子还是健全的嘛，对许多事的处理还是对的，虽然有时有分歧意见，但是正常的，基本上是团结战斗的。”当郭玉峰同志电话质问时，他慌了手脚，又要耍赖，马上叫工作人员给他念常委会记录，暗示删节修改。还让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写假证明送中组部，以掩盖他的卑劣行径。

今年四月，参加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带回来国家体委群众揭发庄则栋到甘肃搞阴谋活动的问题，随即就向洗恒汉作了报告，在常委扩大会议期间，他不理不睬，直到四月九日常委扩大会早已结束，他还说他忙，未来得及处理。之后，他召集了几个书记和蔺

进生参加，说“这件事不要外传”，并给年继荣交底，“不是怀疑你，你年轻，怕你说漏了”，“领导之间互相怀疑不好”。

华主席、党中央派肖华同志来兰州军区工作，洗恒汉大造谣言，在常委会上说：“我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又管军队，又管地方，实在忙不过来，所以向华主席建议，由肖华同志来军区任政委，这样我就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抓地方了。”他还通过亲信在下边散布“政委（指洗）还是政委，还是军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肖华是政委，排列第四位”。抬高他自己，贬低肖华同志，蒙蔽群众。

广大群众要求彻底查清庄则栋来甘肃搞阴谋活动的情况，洗恒汉在四月十四日的常委会上说：“庄则栋来，接触面小，就那么个事，中央认为有问题叫我们搞就搞嘛！”“怎么个彻底查清呀！”还说：“庄则栋来甘肃搞阴谋活动，这话中央没有讲嘛。”不让在文件上写明要清查的重点是庄则栋来甘肃，读书班，《战长年》等。还说什么“《战长年》那时只能是那样写，不然吃不了那碗饭”。广大群众对洗恒汉的所作所为产生强烈不满，非常气愤，到处议论纷纷，他布置他的亲信要抓“阶级斗争动向”，要追查“谣言”，要各级党委“加强思想工作”，“统一思想”，压制群众议论他们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出面，分别找省委常委做工作，为自己开脱罪责，不要揭发他的问题。五月，洗恒汉借宋平同志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之机，又提出在家常委要统一对铁路问

题的看法，妄图压服不同意见的同志。

兰州军区司令部运动办公室提出要他的亲信淮文瑄回军区交代写反动剧本、向“四人帮”写信诬告韩先楚同志等问题，洗恒汉一方面发泄不满，攻击军区要“整他”，一方面又布置他的同伙，让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时统一口径，不同意淮回军区。省委常委讨论议定让年继荣交代问题，洗不让别人插手，由他自己和王国瑞找年谈话，洗只让年交代四个问题：读书班，庄则栋来甘肃，铁路问题，兰化问题。不让年谈和王洪文吃饭、密谈问题，给毛远新写黑信问题，洗还说什么“那是给毛主席的信，是正常的，涉及到这封信的事不谈”。洗恒汉的秘书陈文生还给年说：“你就是再老实，宋平他们对你是不会相信的，不会饶过你的，要不是洗政委的话，就凭你参加中央读书班这一件事，他们也可以审查你。”和年又一次订立攻守同盟，负隅顽抗。

今年五月下旬到六月初，在贯彻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找差距、揭开省委内两条路线斗争盖子的十天省委常委会上，洗恒汉大耍两面派手法，继续捂盖子，耍花招，保自己。一会儿装腔作势地说：“我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向党、向大家说明，我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在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更没有参与过他们的任何阴谋活动，也没有向他们个人写过任何信（包括表忠、劝进、挂钩、以及工作方面的情况反映等），他们也没有给我写过信，我没有给他们送过任何东西，他们也没有给我送过任何东西。就连探

望、请客、照相等这类事，我也从来没有搞过。”一会儿却又讲他的这个问题在军区讲了，那个问题在中央讲了，还发了简报，矛盾百出，马脚四露。在六月五日“讲话”前夕，他见大势已去，但仍无悔改之意，继续对抗华主席、党中央，甚至说：“这里干不成了，就回广西老家去。”六月五日的讲话，既是洗恒汉坚持“四人帮”立场，对抗华主席、党中央，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真面目的彻底大暴露，又从反面发动和教育了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我们一定要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和“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除恶务尽，将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

（发至公社）